

与鲁迅面对面

钱理群 著

百家小集



北大教授钱理群“退思录”之七，“告别宣言”以后的再出发
深广的忧虑，不合时宜的提醒，把自己“烧在里面”的解剖

以鲁迅为原点，重新反思当代中国的命运与未来
超越现实，呼唤生命的意义，坚守知识分子的本分



——与鲁迅面对面——

钱理群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与鲁迅面对面 / 钱理群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5.5

(百家小集)

ISBN 978-7-218-09925-5

I. ①与… II. ①钱… III. ①鲁迅研究—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313436号

Yu Luxun Mianduimian

与鲁迅面对面

钱理群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特约编辑: 季东

责任编辑: 古海阳 梁茵

装帧设计: 张绮华

责任技编: 周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10千

版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 自序 —

这是一本十来万字的小书，是我正襟危坐的学术著作之外的“胡思乱想，胡说八道”，是为“退思录”之七，主要写于二〇一三年。因为过于杂乱，现在要编辑成书，就勉强归归类，以显示无序中的有序。

“与鲁迅面对面”，这一直是我的生命、写作的出发点。我始终觉得鲁迅就在身边，和我、我们一起观察、思考、评论当代中国。我总是从鲁迅那里得到启发，然后，接着往下讲。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讨论：如何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怎样看待中国的改革？如何对待“民族主义”？中国的希望在哪里？还有，“中学生与鲁迅相遇的意义”……

“给生命以意义”，是我和当代青年（大学生、志愿者、新一代打工者）的对话。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思想问题的讨论：如何才能健康地、快乐地、有意义地活着？在未来四五十年间青年将面对怎样的世界和问题？二是现实问题的探

讨：志愿者中的“新生活运动”有怎样的意义与价值？怎样建立农民工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这些都是二〇一三年在中国底层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却不被知识界所关注。我有幸接触到了，就有了新的思考与讨论。

在与青年对话的同时，还有和中小学教师的心得交流：在当下中国教育体制下，“坚守”教育的本分意义何在？如何“坚守”？

“坚守知识分子的本分”，集中了我对中国当下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与言说。年初提出“好人联合起来，做几件推动体制改革的好事”，这是我在二〇一二年提出要“在教育之外谈教育”以后的一个自觉的新努力。以后，又一再讨论知识分子的本职本分：关于“保卫探索真理的权利，继续为真理而斗争”，关于“寻找共同底线，理直而气不壮”，关于“见坏就上，见好就收”（这是秦晖先生的主张，我做了发挥）；关于“要超越现实，更关注精神问题、人性问题”，关于“推动自下而上的民间社会改革，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等等。其中有深广的忧虑，不合时宜的提醒，更把自己“烧在里面”。知我者自会领悟，就不必多说了。

二〇一四年三月七日

目次

辑一 与鲁迅面对面

002 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

026 在高中与鲁迅相遇的意义

——王广杰主编《在高中与鲁迅相遇》序

辑二 给生命以意义

048 给生命以意义

——谈“静悄悄的存在变革”

081 青年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

099 我们需要这样的反思和试验

——区纪复《愈少愈自由——盐寮乐修二十年》序

- 105 寻找城市的根，重建城市与乡村、自然的联结

——读“留城青年故事”的感想

- 114 提高农民工的文化自觉

——《平民教育人文读本》总序

- 121 如何建立“文化身份自信”

——给“新农民工”的一封信

- 130 最适合坚守的人

——读田帅军的《这里，有我！》

辑三 坚守知识分子的本分

- 156 寻找共同底线，坚守知识分子本分

——在秦晖《共同的底线》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 163 保卫探索真理的权利

——在《国士——牟宜之传》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 168 不可遗忘的历史

——我读《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

182 “他山之石”引发的思考

189 赞“胡说八道老来风”

——在《林鹏随笔》出版座谈暨学
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辑一 与鲁迅面对面——

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危机、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空前活跃，也空前混乱的时代。每一个人关心时事，喜欢思考的人，都充满了焦虑，困惑和迷茫。如何认识当下中国社会，怎样把握中国的未来发展，即“中国向何处去”，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办”都成了回避不了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限于空谈，也不能一味发牢骚，在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对历史与现实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思想理论资源。鲁迅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要求下，显示出它的特殊意义和价值。这些年我一直带着这些现实问题，去重读鲁迅著作，突然发现鲁迅的许多精彩论述，让我眼前一亮，茅塞顿

开，引发了许多思考。下面就具体地谈谈我的学习心得，和诸位分享。大概有七个问题。

一、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鲁迅在《随感录·五十四》（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热风》）里，有这样一个概括：“中国社会的状况，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松油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我由此想到了当下的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几十世纪缩在一时”了。具体地说，中国的西部地区很多地方还处于“前现代社会”；西部地区的部分地方，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大部分都进入了“现代社会”；而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就已经是“后现代社会”了。这是就整体而言，在每一个地区内部，又都存在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差异。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地区差异巨大、发展不平衡，各种社会形态“摩肩挨背的存在”的大国，这就构成了我们的基本国情。

我由此而联想到三个问题。

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我经常对关心中国的外国朋友说：仅仅从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发展来认识中国，是片面的，它会遮蔽许多中国的真实问题；你们必须深入到中国的社会底层，穷乡僻壤。那里才有更真实的中国。我也对中国的

大学生们说，你们必须到农村去，到还在点松油片，推独轮车的地方去，当你亲身体会到，中国的农民、老百姓，他们是“多么的苦，又多么的好”时，你就真正懂得中国了，而且也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怎样确定中国的发展道路？必须以社会发展不平衡这样一个基本国情作为前提，针对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问题，寻求不同的发展道路、方法和速度，切忌“一刀切”和“一窝蜂”，而这恰恰是当下中国发展的最大问题。这不仅是中国各级政府的问题，也关系到民间志愿者支农运动的发展方向，我经常对他们说，不要以为你们去支农就一定给农民带来好处，如果脱离当地农村发展的实际，乱来一气，说不定会帮倒忙。

也许是更重要的，我们在思考中国问题时，也必须以其发展不平衡性为前提，采取更为复杂的态度。我多次讲到自己的一次尴尬遭遇：我在北京书房里，站在后现代的立场，对贵州发展中少数民族语言的丧失问题，忧心如焚，于是特地跑到贵州各地，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发出“拯救民族语言”的呼吁。结果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毕业以后的就业问题。懂得民族语言，并不能帮助我找到工作；首先我要懂汉语，而且最好能精通英语。因此，我想请教钱教授：要如何才能学好英语？”我的尴尬并不在我的呼吁不正确，而是我把问题简单化了，没有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在寻求

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的复杂性；更成问题的是，我的那种想当然的居高临下的“拯救”姿态，而不是和少数民族兄弟一起共同面对真实存在的问题。我由此得到的更大启示是，我们在处理中国的思想问题，倡导各种思潮时，也必须考虑到这种不平衡性，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会遇到不同问题的。我自己就发现，我的具有强烈启蒙主义色彩的演讲，在不同地区的听众中，是会有不同反响的。前些年，我到西北地区讲“五四”的科学、民主传统，受到了空前的欢迎，现场气氛之热烈，让我想起了八十年代的类似场景。但我在北京讲科学、民主，听众的反应就要冷静得多，他们常常会从后现代的问题出发，对科学主义、民主万能，以至启蒙主义本身提出质疑。在我看来，西北和北京地区的学生的不同反应，都真实地反映了他们所面对的不同问题和思想欲求，这就要求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思考、言说、处理启蒙主义，及与之相关的科学、民主之类的命题时，必须采取更为复杂的态度。我后来选择了“既坚持又质疑启蒙主义”的立场，就和这样的中国国情有关。

二、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鲁迅于二十世纪初的一九〇七年，也即一百零五年前，在《文化偏至论》里，对现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往者为本体发展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

新役，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呜呼，眷念方来，亦已焉哉！”（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坟》）

鲁迅作出这样的判断，是自有针对性的。他所说的“本体发展之偏枯”，是针对“自尊”而“抱守残缺”的保守派、顽固派，提醒人们必须正视中国本体的专制主义、中华中心主义传统的弊端，强调中国必须变革；“以交通传来之新役”，是针对“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的维新派，提醒人们必须注意“欧洲十九世纪之文明”即西方工业文明，包括其科学、民主、平等的观念可能及已经导致的弊端。在他看来，本体的东方专制主义和交通传来的西方文明病“二患交伐”，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危险，甚至可能导致“中国之沉沦”。

我对此曾有过一个分析：这反映了鲁迅和他们那一代人在寻找、开创中国的发展道路时，所遇到的两难选择：作为一个变革者，当然要反对、批判国内的东方专制主义，为此就必须引入和学习西方工业文明；但此时在西方社会，工业文明已经出现了问题，形成了西方文明病。既要反对东方专制主义，又对西方文明病心存疑虑，这就成了两难，于是出现了四种选择。一是所谓“全盘西化”派，即不否认西方文明病的存在，但认为西方文明病和东方专制主义有“小坏”和“大坏”之别，当务之急是用西方文明来取代东方专制，以后再来解决西方文明病的问题。二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

派，反过来认为还是中国文明最好，甚至希望用中国文明来解决西方文明病的问题。三是“马克思主义”派。他们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同时解决东方专制主义和西方文明病的问题。这在理论上自然是一个最理想的合理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这是后来许多知识分子都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四是鲁迅的立场，即坚持对“二患”的警惕，既用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理念（科学、民主、平等等）来批判东方专制主义，同时又对这些基本理念及其实践保持警惕，并提出“立人”思想，即以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价值理想和现代化目标，对东方专制主义、西方文明病同时采取批判态度。鲁迅的这一思想和态度，显然具有超前性，对今天也还有启发意义；但只限于思想、文化领域，并没有涉及具体的社会实践及制度的建设，他的理想也多少带有乌托邦的性质。

问题是，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是陷入了空想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为了强行实现，也就必然借助于东方专制主义。在改革开放后，又在坚持基本体制的前提下，引入西方市场经济，其结果是导致了西方文明病（消费主义、实利主义、实用主义等等）的泛滥。如果说，鲁迅说的“二患交伐”尚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危险，那么，到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以至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就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这就是今天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我看来，如何对待这样的“二患交伐”的中国问题，

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发展的人，都无法回避的。记得在九十年代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论争中，他们各执一端：自由主义坚持批判专制主义，但对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和西方文明病则尽量回避，或将其作为“未来的祸害”而搁置起来；新左派则以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化作为主要危险，对社会主义本身的问题却态度暧昧。在观察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动向时，我们再一次遇到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全盘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派，而当年的新左派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也由暧昧转向极力理想化，提出了所谓“中国模式、中国经验”论，在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上和文化保守主义合流了。

客观地说，所有这些不同思想派别的分歧和论争，都是鲁迅那一代先驱者面临的两难选择的延续，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切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在寻找国家现代发展道路时所面临的困惑。坦白地说，我自己至今也还没有摆脱这样的焦虑：尽管在理论上我完全认同鲁迅式的双重质疑的态度，但在找到具体的实践之路前，这依然只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与实验的问题，但其前提却是要敢于像鲁迅那样，正视这“二患交伐”的现实：我们需要面对与解决的是两个问题，既有东方专制主义的问题，也有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西方文明病的问题。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都会形成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遮蔽。

三、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

如今在中国，处处谈“改革”，人人谈“改革”。如何看待这形形色色的“改革”，反而成了问题。

鲁迅对“改革（革新）”有一个精辟的论断：“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小杂感》，收入《鲁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提醒：要不要“革新（改革）”，要怎样的“革新（改革）”，是和人在社会经济结构里处于什么地位、是否“阔气”直接相关的。也就是说，革新（改革）的背后是一个政治经济“利益”问题。我们考察当下中国形形色色的“改革”时，必须追问：鼓吹这样的改革的动力是谁？其利益诉求是什么？其利益关系是什么？谁从中获利，谁是利益受损者？

于是，就像鲁迅所揭示的，有三种改革。

一是“曾经”的既得利益者（个人和群体）鼓吹、推行的改革。他们也不满意现状，甚至有很尖锐的批判，批判本身也有很大的合理性；但问题是，他们的改革目的、目标是什么？鲁迅一语道破，就是三个字——“要复古”，不过是要恢复和维护失去的既得利益而已。这样走回头路的选择，注定是没有出路的，而且会从根本上损害民众的利益，但因为其打着